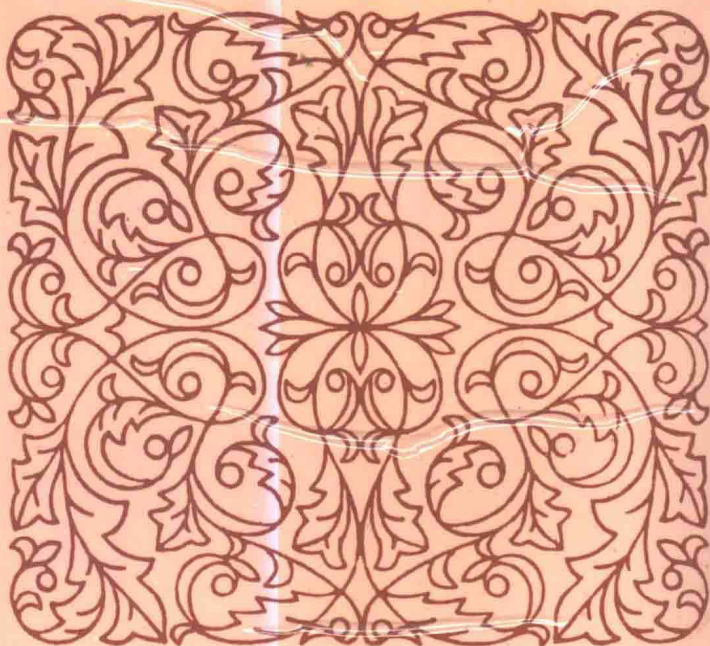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3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63 ·

歷史 · 地理類

宋遼金史

宋代興亡史

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

宋之外交

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

金毓黻編著

張孟倫著

張家駒著

謝詒徵編

黃現璠著

上海書店

謝詒徵編

宋
之
外
交

宋 之 外 交

不 准 翻 印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

編 印 者 謝 詒 徵

代 售 者 上 海 大 東 書 局

承 印 者

四馬路山東路中市
漢文正楷印書局

電話九一八七三

本書據大東書局1935年版影印

蔣序

謝君詒徵編宋之外交一書以相示，余喜其制斷有法，且事事以先哲之言爲評斷，而不涉以己意也。用敢爲之序曰：昔北平遭拳亂，某氏有詩曰：「多少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嗚呼！叫天兒豈可厚非哉！讀書者自命爲通人，彼視全體民族若蚩蚩，而不知其自陷於蚩蚩也。彼叫天之所能，若「嘆楊家秉忠心，大宋扶保」者，蓋正我北方華族，低徊思慕彼效命疆場之勇士，歷千餘年蒙古女真之變，而不能時刻或忘者之迴聲也。孰謂華族不尚武哉！不尚武者，歷代之皇帝，與識字之宰相耳。昔宋之太祖，於五代士大夫，辱人賤行之餘，獨垂不殺士大夫之遺訓，船山亭林皆尊之以爲天牖其衷，焉有爲我千年以來，數萬億衆民族之所紀念所悲歌所演進遺傳，而不能旦暮相忘之邊士，而不能自效於危亡之際哉！不然則書中所謂「潯陽江賣魚，景陽岡打虎」亦足爲社會放一異彩。華族之經兩度經驗，而猶

宋之外交 蔣序

能視息於此大陸者，以此也夫，以此也夫！
民國甲戌夏八月於青島

二

海寧蔣方震

宋之外交

目錄

蔣序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立國方針	三
第三章	外交經過	一三
第一節	對契丹	一三
第二節	對西夏	二五
第三節	對金	三二
第四節	對蒙古	四七
第四章	代表人物	六〇
第一節	王安石	六一
第二節	童貫	七〇
第三節	賈似道與文天祥	七五
第五章	結論	八〇

宋之外交

第一章 緒論

中國歷史上對外關係之重要——在中國全部政治史上對外關係向佔非常重要地位，並非五口通商以後纔是如此，不過在海禁未開以前，中國的外患來自北方的大陸民族，而鴉片戰爭以還，泰西的海洋國家遂發施了改變一切的影響。

現代中國外交應以過去事實為借鏡——北方民族的侵擾中國，遠在戰國燕趙之際，秦漢以來，北國的邊防問題，始終為政府當局力圖解決而未能解決者，歷代實際的治國才具，對於和戎禦戎等等策略的研究，正有過於對治黃河水患的孜孜研究。凡幾千年全國才智應付一種問題所得到的結論與經驗，自然必有許多地方足資後世借鏡的。我人深信，居今日而講求外交政策，一方面固須參攷世界各國的史實先例，但更須從我人祖宗的親身體驗中求得教訓。在純屬工程的治水問題，尚須搜求先世的事實，何況關於人事的對外問題？

宋的外患——民族主義的悲痛——中國一切朝代中間，受到外國壓迫最甚，外交失敗最慘者無過於宋。無論宋朝最初百年的治蹟，據云竟可與漢唐比盛，無論宋代的學術思想如何的發達，詩詞文章如何的優美，然而一旦外患發作，皇帝捉去了兩位，社稷覆亡了兩次，所謂中國文化也幾乎隨之毀滅，所以後世儒者要痛哭流涕的嘆息，說是『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德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王夫之宋論）換句話說，歷代皆亡於自家人，而宋則亡於異族，歷代在外國侵略下，終留有方乾淨土，而宋則斷送了全部的江山，這種恥辱的事實，再見於明朝的末年，因此前有文天祥謝枋得，後有顧炎武黃宗義這輩愛國者起來，知識階級的腦髓中總含有民族主義的無限沉痛。

我人研究宋的覆亡之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哲思想各方面都可以找到重大的原因；我人研究的結果更充分證明了外交與內政的不可分離的關係，證明了『外交為國勢的反映。』不過同時對於宋朝三百數十年間運用的對外政策，一種弱國的對外政策，一種弱國的失敗外交，也發現了許多地方，或則可使我人警惕戒懼，或則可使我人啼笑皆非，或則可使我人大澈大悟。本書因此特從宋的時代背景，立國方針，研究到

它的外交的經過當局的人物提其要領，撿拾如此，以爲我人今日的參證，庶幾後之視今，不致復如今之視昔。

第二章 立國方針

宋太祖開國時的心理——宋太祖趙匡胤的得天下，正當五代十國的時節，海內枕戈不安，他雖然平定了中原，自知帝位極不穩固，所以處心積慮要爲子子孫孫策萬全之計。本他自身的閱歷經驗，有兩樁可能的亡國之禍，使他尤其憂念：（一）唐之亡，亡於藩鎮，五代之亂，亂於藩鎮，野心的將領，被委了一方的重寄，使自帝自王，不服政府的命令，並以政權私相授受，養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一個小小強盜，一旦到了京師，就不客氣地自做皇帝，把唐朝三百年的虛名了之大吉。（二）假如集中實權在中央政府以後，而武臣能夠操縱政治，又恐怕有武臣篡國的禍患，猶如他自己以殿前都檢點的軍職而做了開國皇帝一樣。這兩種禍患都由於武將操縱兵權的緣故，宋太祖懲前警後，覺得預防的方法，第一唯有削奪現有將領的兵權，第二，使現世的將領永久不能操縱兵權。

杯酒釋兵權——關於第一個預防方法，歷史上記載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頗為生動：

『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積多金，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養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比較漢高祖的狡兔死，走狗烹，以致韓彭黢醢，宋太祖的方法自然高明多了。

防止武將的操縱大權。關於第二個方法，宋太祖認為要使武將操縱不到大權，只要（一）使武將取不到財源，所以他設置轉運使一職；（二）使武將不能私有其軍隊，所以他制定更戍法；以及（三）使武將不能接近中央的大權，所以大官都要由文人儒士來做。

轉運使的制度規定各州的租稅收入，除各州的度支經費外，凡金銀粟帛應悉數解送汴都，不得由地方當局占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皆不得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所以各地武將不能取得地方上的財政權了。更戍法大概是這樣的：各州官吏選募了當地健勇的兵卒，送入京都補充禁旅的缺額，一度做了皇帝陛下下的親兵，然後將禁旅隨時分遣邊城戍守，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而均勞佚，同時邊防的武將，也就不能與屬下的兵士發生私人的深切關係。重用文臣——最後便是文臣的重用了。宋史選舉志載：『天聖初，宋興六十有二載，天下差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爲最廣，名卿鉅公皆由此進，而仁宋亦需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據當時統計，仁宋一朝，舉行進士考試十三次，中進士四、五七〇人，每次甲第首三名，共三十九人，其後中間只有五人沒有做到公卿。這一種選舉和

任用制度，在大體上是實行到南宋末造，比轉運使官制和更戍法要來得長久和貫徹的。

輕武與軟弱的國防政策——這些開國政策的自然結果便是造成了重文輕武的一代風氣。先說輕武的情形，按宋太祖本人創業開國，當然注意武事，重視邊防，然而朝廷猜忌將帥之心既已萌芽，到了後世不禁更爲蓬勃茁長。便是宋太祖本人，既存了這種心思，不免隨時流露，無從自制，以致重要的邊防事宜，也不敢放手做去，其影響非常可怕，史書記載當時大將曹翰獻取幽州（實指石晉賂契丹的燕雲十六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輸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帝不能對，遂罷曹翰之議。』

趙普是一介文臣，本能地忌武將立功，杯酒釋兵權以及轉運使更戍法，都是趙普的主謀，所謂『以猜忌之謀，動猜忌之主。』但這次曹翰的建議不行，關於宋朝國防者實非淺鮮，當時幽燕諸州既爲契丹所有，黃河流域的險要形勢，亦即爲契丹所據，汴都在軍事上處於不易扼守的地位，故爲長久的安全着想，不能不及早規復幽燕。可是雄將的謀略，竟因猜忌而中阻，從此在宋朝全部歷史上，十九的時期，幽燕等地都在遼金蒙

古之手。

宋代將才的不易產生——在這一種傾信文臣猜忌武將的制度與心理之下，自然無從產生非常的將才。太祖和太宗都是自任大元帥從事親征的，但他們的軍事勝利，完全由於敵方的積弱無能，並非由於主帥的才能卓異。他們所平服的敵人，也都是武事久廢的藩鎮後裔（五代十國），自然無力頑抗。至於太祖太宗以後的君主，都由文臣教養長大，不熟嫻弓馬軍旅的事情，既不知任用將帥，也不敢重任將帥，結果竟不得不用近幸的宦官爲帥，像神宗之用李憲，徽宗之用童貫便是。終宋之朝，只有一個蕩平小寇僥智高的狄青，和一個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岳飛，可算是卓越的大將。

岳飛之所以死——岳飛之死，非死於秦檜，而是死於猜忌的傳統政治。他的壯志未酬，一部分因爲高宗和秦檜都是金國逃回的亡命，怵於彼方兵勢的強盛，己方實力的不完，當初並沒想像到岳家軍的戰鬥力，所以決意言和不敢戀戰。但大半都因爲岳飛多才多能，名望太大，全國上下莫不向心擁戴，所以他的詞章奏疏，愈是忠義慷慨，高宗的私心猜忌也是愈加深刻，故秦檜得以莫須有的冤獄，害死他於風波亭上。關於這一點，宋以來論者頗有發明，茲不具論。

重文與士大夫階級的習氣——第二說到宋朝重文崇儒的風氣。重用文臣的制度已如前述，太祖又有不殺士大夫的遺訓規定，所以士大夫階級非常得勢，同時士大夫階級的傳統的習氣也表現得特別明顯。這種習氣不外是：（一）不負責任；（二）不切實際；（三）好為黨爭。

不負責任——按士大夫大都歡喜議論是非，批評長短，所以政府舉行一事，革除一弊，處處要提防到士大夫的輿論，使是在位的皇帝也有這種顧慮，大概不在其位的士大夫，則作不負責任的議論，常使一種政策忽行忽罷，不能實行到底，這在宋史上屢見不鮮；至於在位的士大夫，凡公論所謂賢者如呂端、李沆、王旦、文彥博之輩，都是因循舊規，養成一種『恂恂秩秩，苟免彈射的風氣』，其實也就是怕負責任。譬如徽宗時蔡京為相，姦佞專擅已達極點，但他必須假托紹述之說，以避免責任，宋史載童貫蔡攸出師伐遼，於收復燕雲的時候『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因此真正有為的賢者王安石，預備負責行事的時候，要拿『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之說來杜絕妄肆批評者之口。

不切實際——說到宋士大夫的不切實際，幾乎賢不肖皆然，沒有一個例外。譬如范

仲淹王安石蘇軾程頤這些人也算得宋朝文章學術的代表了。但范仲淹當西夏邊防緊張的時期，遇到張載，因他歡喜研究軍事，有征服西夏之志，便警告他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於是張載折節讀書，創立宋學的『關派』。後世稱為『橫渠先生』。所以范仲淹一句空言，雖造成了一位名儒，卻斷送了一員名將。再如宋神宗與王安石談及三國諸葛亮與唐魏徵的治蹟才具的時候，王安石便大言不慚，菲薄孔明魏徵，以爲不足掛齒，而勸神宗效法堯舜，則自有臯夔稷契來做翊贊的賢臣。他這般輕視魏徵諸葛實際的長才，而誇張臯夔稷契傳說的人格，可見其浮而不實的一斑。至於當時號稱蜀黨領袖的蘇軾，不過一個新聞記者的材料，蘇東坡攻擊王安石的奏疏中說道：『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貧。』而於辨募役法中又流露了一種士大夫自私自利的心事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恐非太平之盛觀。』而有名的文彥博，也有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的奇談。（因爲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便，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好爲黨爭——與不負責任，不切實際二者相並而行的便是好爲黨爭。例如號稱洛